

目 录

日本侵略者统治太原八年简述

.....	太原市政协文史办整理	(1)
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汉 明	(10)
日寇血洗娄家庄	李时雨	(13)
娄烦水峪事件	娄烦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15)
消灭敌人 拔掉草庄头据点	张四本	(16)
工卫旅二十一团参加百团大战片断	张四本	(26)
晋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常士晔 郝玉麒整理	(32)
盟国记者团在八分区的观察	康介荣	(42)
太原沦陷后的一段地下工作回忆	武林叶	(45)
阎日勾结活动片断	麻克宽	(57)
阎日勾结的一个侧面 ——从阎军到日伪军的经历	杨 诚	(61)
简述日伪时期的教育情况	马昌启	(106)
日伪时期的太原学校教育	崔汉明	(111)

关于日伪时期扶轮学校的片断回忆	石镜明	(117)
日伪统治太原时期的司法	曹国楫	(119)
日寇统治下的苛捐杂税	王余庆	(125)
日伪在太原的禁烟禁毒	曹国楫	(128)
日寇投降前的保安队	李印堂	(132)
太原沦陷后的遭遇		
——我的艺术生涯之二		
.....	花艳君口述 赵威龙整理	(139)
日伪统治太原时期的见闻	胡敬斋	(148)
日伪警备队干部训练所见闻	俞钟灵	(157)
小娄峰战斗的教训	张四本	(161)
娄烦人民的抗日斗争	褚林祥	(166)
抗战期间古交的群众戏剧活动	康介荣	(172)
《太原文史资料》(第二辑)订正与质疑		(177)
来函照登		(180)

前　　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本辑收集了日本侵略者统治太原八年的有关史料，同时征集了我方在太原地区抗日斗争的部分史料，现予发表，以资纪念。

日本侵略者统治太原八年简述

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沦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八年之中，日寇统治太原的罪行累累，很难尽数。

一、灭绝人性的入城屠杀

日寇一进入太原，不问青红皂白，首先对人民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他们想杀就杀，至于奸淫掠夺，更是随心所欲。比如，陈家村一个叫栓福只的，一出门就被日寇杀死，二话没说扬长而去；永兴堡一个工人和老婆孩子躺在家中，日寇闯进其家，当着其男人就要强奸其老婆，这个工人起来阻拦，被开枪打死，女人受辱后和孩子同死于日寇枪下。类此事例，举不胜举。新满城一个姓韩的老人参加清理街道后说，当时街上的死人有穿军装的，有老百姓，有妇女，也有小孩，有被枪打死的，也有刺刀捅死的，血肉模糊，伏尸累累，饿狗吃人，惨不忍睹。日寇侵入太原的三天之内，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屠杀之中，谁也说不清楚。据精营街一个叫赵家会的街长参加了清理街道后说，从街巷到室内，光往城外运埋尸体，就用了十来天时间才运完。

在陷城的当夜，由于城的东北方面是日寇的攻城部队，守军和逃难的群众只能向河西方向撤逃。经过汾河桥时，上遭敌机轰

炸，下有炮火追击，那时的桥小人多，被拥挤而落水淹死的也有一千多人。这是日寇攻陷太原后的第一笔血债。

二、军事控制

日寇侵占太原后，依靠重兵把守，以军队牢牢控制各种权力，来维持其统治。据查，侵略中国的日军统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驻南京。下辖华北、华中、华南、蒙疆四个派遣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驻北京。最初侵占太原是板垣和川岸师团等部。一九三九年春又新建华北派遣军之下的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是签定何梅协定的日方代表），司令部驻侯家巷（前山西大学），后迁入新建大楼（现山西省军区）。先后任司令官的还有岩松义雄、吉田、澄田等人。

最初守太原是一个师团，代号山冈部队，驻东缉虎营一号。一九三九年改称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代号溜渊部队、赵生部队、池上部队等。

日寇在太原有个陆军特务机关，机关长谷萩那华雄。四二年这个特务机关升格为省级机构，机关长由花谷正继任，但太原的仍并存，机关长石户中佐。这个组织是专门招降纳叛；建立、操纵伪政府；控制、干预伪职人员的任免；以通牒形式对伪政府发号施令，以保证伪职人员效忠于他们。他们的控制方法，一是遥控；二是派员在伪机构中坐镇。这个组织人员经常更换，但任务不变。

另外还有个工程队，是专管由各地抓来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人士和当做有问题的普通群众的看管、刑讯、强迫劳动的。被关押在这里的人，有的死于酷刑之下，有的死于劳动场所，有的被集体屠杀，有的被送往日本做苦役，逃脱出来的只是少

数。

有几个用日人名字晋中、白井、茂川、笛井等 等 命 名 的公馆，实际都是日寇特务组织的代号。这些公馆，是专门搜集情报，掌握情况，进行策反活动的场所。

日寇的司令部和下面部队都设有同样性质的特务、情报等机构，但名称诡异。

日寇兵力不足，不得不组织伪军为他帮凶。一九四〇年阎锡山辎重兵司令武尽英投靠日本，在太原组成兴亚黄军，四二年分别并入阳曲、清源、徐沟的警备队。一九四二年阎锡山的两个师长赵瑞、杨诚被俘降日，其部队编为山西剿共军后，开住陵川、武乡一带。太原城内主要是日军配以伪警察控制。

三、建立傀儡政权

日寇侵略者非常清楚，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征服中国是办不到的。所以经过一场入城屠杀之后，就贴出了安民布告，大意是：日军来中国是“日中亲善”，搞“大东亚共荣圈”。今后日军不随便进入民宅，老百姓都可以回来过“安居乐业”的日子等等，以安定人心。接着就招降纳叛，开始建立傀儡组织，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政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陆军特务机关长谷萩那华雄把小海子一个叫曾纪纲的人推出来，宣告太原成立了维持会，曾纪纲为会长。不到一个月，一个宣抚官进到维持会，曾纪纲没立即站起向其脱帽行礼，这个宣抚官当众大骂曾纪纲是混蛋。曾一气之下服大烟土自杀了。

曾纪纲死后，谷萩那华雄就让小剪子巷八号一个叫韩谦的前清举人，以维持会秘书长的身份代理了维持会长。不久，又让一

个当过国民党参议员的高步青当维持会长。一九三八年春，将这个维持会改名为“山西省委员会”，并在这个基础上筹备建立伪山西省公署。实际，当时这只是太原的一个伪组织，根本管不到外地，而且韩廉、高步青也不是日寇的理想中人。这事从韩、高二人亲到北京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求正式委任，而没被批准，就可说明。

一九三八年六月份，日寇选择了苏体仁当山西省伪省长。把“山西省委员会”改为“山西省公署”。苏体仁，字象乾，朔县贾庄人，早年留学日本。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时，曾多次为阎在日本人的大仓商行购买军火，得到了阎、日双方的信任。日寇可以利用阎苏的关系争取阎锡山妥协；阎可以通过苏勾结日寇对付八路军，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苏体仁当然更清楚，所以有恃无恐，心安理得地出任了日伪的第一任省长。而且后来为阎日勾结也起到了桥梁作用。

苏体仁的伪省公署下设一个秘书处，处长李升培，辖经理、考绩、秘书、交际、总务五个科，秘书、函电、监察、法务、机要、统计六个室。秘书处是伪省公署的办事机构。后来又陆续增设了警备处（后改为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后改为宣传处）等。

伪省公署的民政厅，厅长宋澈；财政厅，厅长宋纯如；教育厅，厅长裴润泉；建设厅，厅长张联魁；警务厅，厅长白文惠。这些机构在苏体仁上台后，一律由上官巷（现公安厅所在地）迁到阎锡山的督军府（现省政府）办公。

太原沦陷前属阳曲县管辖，所以沦陷后日寇让么伯彰当了阳曲县知事。一九三八年春，成立了伪太原市公所，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科。四一年、四二年又陆续增设水道管理处、经济科等机构。一九四三年，又把晋源县和徐沟、清源、阳

曲三县的一部分地区扩入太原市，将原来的科升为局，正式建立了伪太原市政府。出任市长的先后有白文惠、张敬灝、业原灵、张叔三、牛心田等人。这个“市政府”和“省公署”的机构大同小异。

表面看，以上简述的伪机构很象个完整的政权机构。实质上，这些机构中都有日寇的顾问、辅佐官或专员坐镇掌权。伪官员的一言一行都是为日寇起帮凶作用。

四、进行经济掠夺

日寇发动侵略战争的供给措施是以战养战，控制、掠夺经济又是其进行侵略的主要目的之一。

日寇占领太原后，立即用军队控制了所有的厂矿企业。同年十二月就把许多厂子的好机器抢劫到日本去了。为了利用当地资源，继续进行掠夺、搜刮，又强迫工人在劫余的设备上限期开工，不少工厂在十二月就又开工了。随着，所有库存的材料和成品，当然都为日寇所有。

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又把军管的各厂资产作为投资，交给掠夺中国财富的日本财阀组成的“株式会社”，并吸收了一些经纪人和工贼进行经营管理，而日本军队坐享盈利。

一九四一年在太原成立了“山西炭矿株式会社”，又名中兴公司，专门控制东、西山和阳泉、富家滩等地煤矿的生产。

对农产品的掠夺，一般是利用伪政府搞征派，但由于数量过大，农民入不敷出。所以每到秋、夏刚刚收完粮食，日寇就带领伪官员、伪军一齐出动，挨门挨户强行征收。伪合作社的车辆尾随拉运，搞的老百姓少吃无穿，叫苦连天。

日寇为了全面掠夺农产品，在太原先后成立了杂谷、棉花、

皮毛、木材等经济组合机构，按其指挥加工储运，供其侵略使用。

为了全面掠夺的需要，日本的军阀和财阀联合在北京组成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电业株式会社”、“电讯电话株式会社”等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太原都设有分支机构，垄断了山西的各行各业。同时，还在太原设立大仓、三菱、三井等洋行，通过做生意手段掠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至于各种税收更是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日寇全面掠夺的另一个手段是发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币”。最初这种联合币券和银元是等价使用，黑市最高一元三、四角就可兑换银元一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紧缺，物价不断上涨。到一九四四年以后，联合准备银行的五百元钞票出笼了。尽管日军参谋部在一九四〇年就组成物价控制委员会，宣布重要商品价格不得上涨；一九四一年又宣布了公定价格；又下令宪兵团、领事馆、警察所组成经济警察班，负责处理违反经济案件，但并未解决了物价的上涨问题。当时，太原的社会上流传着“孔子拜天坛，五百顶一元”的民谣。

五、宪兵团穷凶极恶

太原宪兵团是日寇侵略军的军事警察机构。这个组织既管军队事情，又直接插手地方的搜集情报、策反、诱降、抓捕、杀害等罪行。

日寇深知他的殖民统治不得人心，所以继他的大屠杀之后，又使用宪兵采用不间断的告密、抓捕、刑讯、杀害等手段，以镇压人民的反抗。

宪兵团对人民的镇压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他们网罗地痞流

氓、料子鬼、兵痞和卖身求荣死心塌地的汗奸做便衣，凡被这帮人告密或抓进宪乐队的人，白天站木笼，晚上遭受吊、打、灌冷水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狗咬、上电刑的折磨。不承认是抗日或“破坏治安”，大部被折磨而死；按他们的逼诱承认了的更得死。因为他们的告密、抓人不要事实根据，所以老百姓视宪兵、便衣犹如蛇蝎，无不闻而生畏，望而却步。每逢这帮人家的婚丧喜庆，士农工商无不赶送厚礼，生怕一时得罪招致横祸。日寇为鼓励这撮帮凶，对他们制卖毒品，包娼放赌，巧取豪夺等行径一律听之任之。这些汗奸走狗越来越肆无忌惮，招摇过市，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其中最讨日寇欢心的麻子清、田子峰、王茂元、李天祥四人，因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宪乐队的“四大天王”。日寇为推脱责任，缓和影响，一九三七年来了个贼喊捉贼的伎俩，将“四大天王”枪杀在南郊，以充好人。

日寇枪杀“四大天王”之后，又用对待“四大天王”的手段，使用屠文茂、毕培天、白俊臣、张效欵、李嘉琳、李云龙、胡子顺、胡廷玺等人，依旧作恶。由于这一伙干坏事和个人的横行无忌比“四大天王”毫无逊色，所以市民叫他们“八大金刚”。

就当时听到的，一九三九年皮革厂工人、中共地下党员田恒、国三红在校尉营联系时被捕英勇牺牲。为此事有三十多人被宪乐队抓捕或杀害。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军统太原站被一网打尽，大部人员经不起酷刑投敌。一九四四年宪乐队在太原的伪政府机构一次就抓了一百余人，其中仅拷打致死者就达十余人。至于市民工商被捕杀者时有所闻，无法计算。许多被抓进宪乐队的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他们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老百姓骂他们“宪乐队万恶滔天”。

六、伪警察横行霸道

伪警察是日寇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太原沦陷不久，日寇就拼凑了一个靖乡队，伪市政府成立后改名警察局，归市属。一九四一年升格，由伪省警务厅领导，改局为署，下设两个警察大队，市区分设分所，各街道设派出所。警察归日寇宪兵队统辖，警务厅、局长不能擅自调动下级的警察。

警察依仗日寇的势力，利用管理市民、户籍、交通、卫生及发放证件和维持公共场所秩序等等之便，敲诈勒索、奸污妇女、保赌保偷、包娼包毒，无孔不入地搜刮民财。他们下饭馆吃好的，进戏院坐好座，不花钱还能得到特殊的招待，稍不如意，到日寇面前告个密，说你“通匪”，你就会家破人亡。总之，这帮人不管土农工商、“三教九流”，谁的油他都揩，下流到连小偷掏的腰包也要分赃。

更可恶的是借监视市民的言论行动，抓捕所谓的“反日嫌疑分子”，进行刑事案件的“侦破”，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致人于死地。

一九四三年，宪兵队把他们的抓捕屠杀之事交由警务厅执行，更助长了伪警察的横行霸道。老百姓为了躲灾避难，只好用烧香送鬼的办法去贿赂他们。但有钱人总是少数，大多群众仍逃脱不了被陷害的命运。伪警务厅长王新崇，当了二年厅长回东北老家时，光东西就装了一火车皮，平时运走多少不得而知。由于警察什么行业都直接管理，往往按他们的意志给老百姓横加罪名，他们把人说成啥就是啥，所以，老百姓叫他们“警务厅一手遮天”。

七、实行强化治安

为维持其统治，除对游击区和我方根据地进行轮番讨伐扫荡外，在日寇统治区先后共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所谓强化治安，就是严密清查户口，举办保甲制度，加紧搜查，实行经济封锁等。每次强化治安，日寇汉奸倾巢出动，全面展开大规模的清查，以镇压抗日力量。

在伪机关的公务人员中，日寇利用他豢养的汉奸密探告密，对看清形势不死心塌地为他干坏事的人，加个“通匪”、“心坏了”的罪名抓捕起来，进行刑讯。有一次就扣捕了近千人，多数被宪兵队杀死，少数花钱讨保幸免。

对市民采用查户口、换身份证件的手段，半夜三更闯宅入户，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对没良民证和外出的人，都要给加个“通匪”罪名，加以逮捕。在五次强化治安中，以种种罪名被抓的不计其数，大部分人被杀害，一些年青的被送到东北下井挖煤，从此不见天日，只有少数贿赂保释出来。

日寇在城门和路口都设卡盘查，封锁交通，以防止物资进入我根据地。凡没有日伪经济合作社证明携带物资出城的人，除没收东西外，还要加罪扣人。

这种治安强化运动，每次都要牵连大批人，轻者吃官司坐牢，重者人头落地，搞的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太原人民就在这种暗无天日，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整整熬了八年。

(根据康耀先、崔玉山提供的资料整理)

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汉 明

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八月期间，在日军占领下的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三百四十余名中华优秀儿女，主要是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抗大学员，以及地方行政人员，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当时，日军的侵略魔爪正伸向我国内地，战线拉长，兵力枯竭，不断从国内征集新兵，送往各个战场充当炮灰。一九四二年七月初，从日本国内送来一批新兵，被分配到驻扎在太原一带的日军独立第四旅团，以补充该旅团兵力的不足。这批应征新兵都是初登战场，毫无作战经验。为此，旅团长津田守弥少将下达密令，要求对从日本调来的新兵进行一次“试胆教育”，即以活靶为对象进行砍杀和刺杀训练。

这批新兵有三百四十人补充到该旅团所属的第十三大队。该大队接管新兵后，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即召集所属进行密谋，他们遵照旅团长的训令，决定将这批新兵的第一期教育检阅课目中的假标刺杀改动为“实的（真实目标）刺杀”。并决定以被集中在小东门里的太原工程队（即俘虏收容所）内的俘虏为对象，每名新兵选一人做为活靶。检阅地点也选定了位于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这里靠近东山，是一片荒野，乱坟遍地，人迹少至的地方，极易隐蔽。

这场大屠杀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有二百二十余名俘虏被集体屠杀。过了几天，就当这批死难者尸骨未寒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这次又有一百二十余名抗日军民惨遭杀害。

两次大屠杀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日酋安尾正纲大佐亲任检阅官。屠杀当日，从小东门里的俘虏收容所至小东门外的屠杀现场，数里之遥，全部封锁。所有参与人员全部荷枪实弹，严密戒备，以防止罪行暴露和俘虏逃跑。

检阅开始，由全体新兵进行学科操练。接着，由检阅官下达了刺杀训练的预备令。这时，赛马场陷入了一片恐怖。以劳动名义被骗至现场的一个个俘虏人员都双手反捆背后，每七、八名分为一组，以两米的间隔排成一列横队，迫令跪倒在地。在距他们前方十米处，都相应地站着一名新兵，凶眉恶眼地端着枪上着刺刀。更令人发指的是，把每名俘虏的上衣全部解开，露出了胸膛。这时，一个个新兵都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杀气腾腾地在待命。

一声令下，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开始了。

穷凶极恶的野兽兵“哇”的一声狂吼，象野兽一般地疯狂，刺刀冲向了每名俘虏的胸膛。刹那间，一个个中华儿女的鲜血淌在了地上，横尸遍地，惨不忍睹。在第二次屠杀时，其中有五十余名抗大的女学员，她们临危不惧，挺起胸膛，怒目横视，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的呼声震动了赛马场整个上空。

当这呼声响彻云霄之际，一名被俘战士乘着一片大混乱，挣脱了绑绳，拼死地向东山逃去。当日军发觉后，立即派出士兵跟踪尾追，一直追到东山，并放出军犬搜索，没有发现，只好鸣枪示

警，空手归来。

后来，这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赵培宪同志（解放后历任云南蒙自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逃回了解放区。不久，在解放区的报纸上进行了血泪控诉，揭露了这场秘密大屠杀的真相。解放区电台也播出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这种践踏国际法准则的兽行，受到了国际上所有正义人士的谴责。因此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感到万分惊慌，对这次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侵华日军军官住岗义一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第四小队少尉小队长兼机关枪教育队新兵教育队教育官。这次屠杀中，他以上述身分做为安尾正纲大佐的少尉辅佐官参与了这一罪恶行动。解放后，住岗义一为我扣押。在审讯期间，对这次屠杀事件做了供述。经我反复查证，并对现场尸骨做了鉴定，同时查阅了有关档案以及当时被屠杀的唯一幸存者——赵培宪同志的见证，其供述情况属实。

（作者系太原师专教师）

日寇血洗娄家庄

李时雨

一九四二年农历十月初一，日寇突然奔袭到了我县二区娄家庄，对中国人民又犯下了一桩滔天罪行。

这天早晨，几路鬼子从各个方向扑向娄家庄。一双双眼睛四处窥探，唯恐遇上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当敌人确信村中没有抵抗的时候，胆子就放大了，边走边鸣枪放炮向村子接近。村里的人听见枪声炮声，很快转移到村后的山梁上。有几家因身患伤寒重病不能行动的，由于情况紧急，人们顾不上把这些病患者抬走，不得已留在家里。

鬼子一进村就到处点火，一霎时房子着火了，庄稼场里着火了，一座座庄院、一堆堆粮草化为灰烬。躲在村背后山梁上的群众，看到自己的家院被毁，看到自己的粮草被烧，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但武工队与游击队因有重要任务到别的地方去了，心急又有什么办法？村中猪羊牛鸡的惨叫声，更加上人的号啕痛哭声，传到人们的耳朵里，象一把把刀子插在人们的心上。

残暴的鬼子在村里遭害了一天，将近日落时分，才像一群凶恶的豺狼，离开了娄家庄。他们抢走娄家庄一群一群的驴骡牛马，一群一群的猪羊，骡驴牛马背上驮着娄家庄人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鬼子走后，人们陆续返回村里，只见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灰

烬瓦砾，烧得半死的猪羊，连皮带毛的鸡扔遍街道。吃的剩下的猪腿、羊头、鸡翅膀在人们的足底下乱滚。房子烧了，粮食抢了，没有打的庄稼还在冒着青烟，家家的门窗没有了，铺盖被褥没有了，坛坛罐罐、盆盆碗碗，连同铁锅、勺子都烂的烂，断的断，没有一件完好的。善良的人民一个个流下了辛酸的眼泪。那几家因病来不及转移的群众，都做了刀下之鬼，最大的八十来岁，最小的才三岁，没有一个幸免。李新果老夫妇俩的人头被割下来抛在院里，尸体被剥的精光扔在大门口，身上挨了七八刀。李正为的老伴和她的独生子李海玉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在炕头上，鲜血染红了土炕，再流到地下，惨不忍睹。李维善和他的十二岁的儿子李国平被烧死，他妻子和三岁的女孩也遭杀害。看到这些场面，人人恸哭失声。

这次浩劫，日寇杀害男女老少八人，把李正为、李为善两家杀绝。共烧房子一百四十七间，石窑九眼，所有门窗被毁，损失粮食二千多石，各种桔草百十多万斤，抢走牲畜百十多头，猪羊鸡近千只，衣物五六百件，其它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毁坏。

娄家庄的被洗劫，是日寇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一个例证，它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的义愤。日寇想用惨酷的烧杀抢掠手段，达到征服中国人的目的，但是人民并没有被他们的杀害所吓倒。在党和各级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娄家庄的人民同仇敌忾，更加积极生产，全力支援子弟兵。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是不能遗忘的。让我们牢记这血的教训，为保卫祖国，为世界和平多做贡献。

（本文系娄烦县政协文史办供稿）